

父亲

父亲

主笔 ✍ 徐菁菁

一直以来，我们撰写过许多与家庭有关的封面故事。在绝大多数时候，我们将目光集中在孩子身上，引导父母们关注最新的教养理念，反思原生家庭如何影响我们养育下一代。但是，对于家庭而言，可能还有一些更为重要和基础的议题。本质上，家庭是由夫妻关系和子女关系结成的生活共同体。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承担不同的角色。我们可能是同时是妻子、母亲和女儿，或者同时扮演父亲、丈夫和儿子。这些角色的协调与否，事关我们每个人和整个家庭的福祉。但是，我们很少审慎地思考这些角色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今天的中国家庭里，有一个角色正在面临最多的批评。“丧偶式育儿”成了流行语，你总能看到一些妈妈们痛陈孤立无援的育儿生活。除了为家庭提供经济上的支持，父亲似乎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这是因为父亲们对育儿工作不感兴趣，不负责任，懒惰或是逃避？

父亲角色的本质即是一种存在于家庭中的关系。时代在变化，家庭在变化，人们的需求在变化，关系也在变化，这都需要我们在批判之前，抛开情绪，重新去理解当下的父亲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历史线条上看，中国的父性与西方的父性都经历了现代性的扫荡。在传统的父权社会中，父亲都是令人畏惧的不可忤逆的绝对权威，他不仅是家庭的领导者，也是教育者及精神支柱。近现代，社会的变革将传统父亲的职能和地位逐一消解。孩子的教育由学校接手。父亲不再能够为他们提供职业和社会经验。代与代之间的联系被世界的飞速进步碾碎。于此同时，女性开始争取性别平权，把自己从母亲身份中部分地解脱出来，进入社会生活。所有这些变化都意味着父亲必须重新寻找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

中国的父亲们也在面临一些特殊的困惑。中国

社会的变化如此之快速剧烈，我们对于父亲这个角色要求，可能仅仅在两三个世代间就发生了巨变。今天的我们普遍要求父亲为家庭成员提供情感支持，然而，早两代的父亲，经历着连续不断的战争、运动，在他们抚养孩子的过程中，生存是第一要务，情感支持是奢侈品。对于很多新一代父亲而言，他们并没有从父辈身上学习到今天作为好父亲的必须技能。反思自身，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回应家庭的新需求，这个过程极为艰难。

与此同时，回到家庭这个系统。当一个孩子降生，丈夫和妻子都在经历一场身份认同的巨大冲击。中国女性承受着巨大的性别压力，她们极为需要得到丈夫的支持和理解。一旦丈夫无法看到这种需求，并给予积极的回应，很快就会出现人们常说的中国式家庭的模式：缺席的父亲+焦虑的母亲+失控的孩子。

那么，在我们的时代，怎样才能算得上好父亲？2006年，美国卫生部组织编写了一本小册子《父亲在儿童健康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它提出，“父亲功能”包括七个方面：1. 和孩子的母亲培养积极的关系；2. 花时间陪孩子；3. 养育孩子；4. 恰当地规训孩子；5. 引导孩子走向家庭以外的世界；6. 保护和供养；7. 成为孩子的模范。我们认为，世界上从来不存在完美父亲，我们不可能要求父亲们面面俱到的做到一切。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每个父亲们有不同的个人追求，每个家庭都有他们独特的资源条件和生态，父亲们有权利选择自己担当父职的方式。但好父亲依然存在一些基本的标准，这些标准时代对父亲这个角色的刚需。它们是：1. 能够与妻子保持良好沟通，形成家庭分工合作的共识；2、能够与孩子建立积极的情感互动；3、能够实现自我的成长与进步，为孩子树立模范与榜样。☑

成为父亲：父职的消解与再发现

主笔 / 徐菁菁

传统的父职已被消解，今天的父亲们正处于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他们必须探索与回答：何为父亲？

爸爸去哪儿了？

8个月前，我升级成为了一位母亲。从小家伙降生的那一刻起，无分昼夜，生活变成了以哺乳为节点的一个又一个小循环。幸运的是，由于家里老人的有力支持，新妈妈的生活并没有太难熬。我没有像许多母亲一样感到手足无措、压力如山。照料孩子之余，我很快就尝试安排了一些属于自己的时间，恢复阅读、运动。四个月产假结束后，我重新投入了工作。但我并非没有困扰。我先生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任职，日常工作繁忙，晚上8点到家就算难得。即使在家中，他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在各种微信群中处理公务。由于有老人在，孩子的日常照料几乎不用他插手。夜间，我基本独自承担照料女儿的工作。有条不紊的日子里，仍有一种焦虑会时不时地向我袭来：如果没有老人的帮助，他是否能够有力地分担孩子的日常养育，做一名合格的父亲？

这种焦虑的产生有很多原因，其中一点很可能是我被卷入了某种集体性恐慌。这两年，我关注了很多育儿主题的自媒体、公众号。一个名词时不时地出现在我所阅读的文章里：“丧偶式育儿”。在这些文章的评论里，你总能看到许多妈妈痛陈她们孤立无援的育儿生活。

2015年，央视主持人李小萌辞职回归家庭。过去几年，她来我家做客，每次都带着女儿，和我们谈论她在养育孩子过程中的心得体会。2018年，她决定重回荧屏，第一个作品就是12集的访谈节目《你好爸爸》。李小萌说，她发现，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思考过妈妈和爸爸在孩子生命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当她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本能地先把目光投向了“父亲”，因为在她身边，太多的家庭结构都是姥姥、姥爷、阿姨和妈妈带着孩子，爸爸是一个偶尔出现的人物。在她自己的家庭里，女儿也极少有

机会得到父亲的陪伴。

一些数据可以佐证这些个人经验性的感受。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每10年会进行一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最近一次，也就是2010年第三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在40岁以下的被访父亲中，最近一年从不或很少照料孩子生活的占到70%，从不或很少辅导孩子功课的为47%。另一项更近期的调查来自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上海市妇女联合会发布的“2015年上海家庭教育现状分析”调查报告显示，孩子的生活主要由父亲负责的比例，从2005年的12.2%下降至2015年的9.6%；孩子的教育主要由父亲负责的比例，则从2005年的30.2%下降至23.7%。

“丧偶式育儿”这个词很有传播力，因为它以夸张的戏谑近似粗鲁地概括了一种被普遍感知的现象。但是，这种概括的潜台词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判断：父亲们是不负责任的、不可靠的、懒惰的、逃避的、缺乏作为父亲的自觉的。但事实似乎并不是这么简单，就像我的焦虑，充满了矛盾，且指向不明。就拿夜里照顾孩子来说，我常常戏谑：“祝你拥有婴儿父亲般的睡眠。”绝大多数妈妈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孩子在身边小床上的一小声哼唧，就足以让她们瞬间惊醒，但婴儿的号啕大哭也未必能吵醒父亲。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每当我频繁夜起，独自完成喂奶、换尿布、哄睡这一系列规定动作时，我难免会心生抱怨。但事实是：我并不愿叫醒丈夫。一方面是想保证他第二天上班的精力，另一方面，“他又能帮上什么忙呢？”我必须承认，为数不多的几个黎明前夜，我在困倦至极时叫他起来搭把手，他并没有任何不情愿。既然如此，我的焦虑究竟源于客观现实，还是一种主观的想象？我对父职的期待到底是什么？

做《你好爸爸》这个节目，李小萌说，她一开始是奔着控诉去的，一路走来却发现父亲们的许多难处。她举办面向爸爸们的活动，现场一问，他们基本都是应妻子的要求来的。但是交流起来，爸爸们也有委屈要说。“他们都在想：现在妈妈都是专家，我们都没有发言权，我做什么都是错的。妈妈在这





个领域里确实掌握了太大的话语权。”李小萌说。她在一个公众号上开课，讲育儿书籍，叫《妈妈读书会》。一次她给这门课拍宣传片，导演是位年轻父亲。他突然提出自己的不满：你光给妈妈读，不管爸爸，不说爸爸的事。

或许，成为母亲和成为父亲本身就是两个不同的旅程。回到小生命诞生之初，李小萌记得女儿一降生，她就“爱得不行”。我是那种慢热型的母亲，但孕育生命的过程足以让我将养育内化为自己的天职。心理学理论认为，为了实现直立行走，人类的骨盆变小，胎儿在母体内孕育的时间缩短，人类都是事实上的“早产儿”，需要经过漫长的婴儿期。在孩子生命之初，他们依然需要受到子宫般的呵护，他们和妈妈是一体的。但对于父亲而言，孩子出生前将近一年的时间，他只负责提供精子，与孩子之间缺乏生物学上的牵绊，也不存在应承担的生物学



左图：图说假字图说假字图说假
右图：说假字图说假字图说假字图说

责任。对孩子来说，父亲不可或缺的状态在受精卵形成后基本就已结束。

美国特拉华大学 (University of Delaware) 人类发展与家庭研究教授鲍勃·帕尔科维茨 (Rob Palkovitz) 认为, 男性可在生理层面转变为父亲, 但是并不容易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行为以适应父亲的角色。做一个父亲的样子和责任, 都与做一个丈夫不同, 需要另一种承诺。这种转变将影响男性在每一天生活中的选择、行为和事情的优先顺序。男性需要慢慢成长, 才能逐渐扮演父亲的角色。

面对一个呱呱落地的婴儿，很多父亲都会产生强烈的不真实感。演员包贝尔告诉李小萌，他十分期待孩子的降生，但当他真的看到孩子的时候，他却找不到想象中应有的强烈的连接感，于是，他就像许多父亲所做的那样，等孩子两三岁了，能交流了，才开始介入孩子的教养。

前几年，湖南卫视的真人秀《爸爸去哪儿》播出后，加拿大爸爸夏克立成了“映衬”中国爸爸的模范。他对女儿的陪伴令许多母亲都自叹弗如。他和女儿一起疯玩，一起染头发。不久前，女儿想打耳洞又很害怕，他就和孩子一起打了耳洞：“你看，什么事只要有个人就不难。”但事实上，和包贝尔一样，夏克立也曾经在新生命面前找不到感觉。他的解决办法是把所有照顾婴儿的细节都承担起来。他说，既然没有像母亲那种天然的物理性的连接，就要自己努力在关系当中去寻找。

“成为父亲”对于许多男性而言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父亲”之名带来的压力和困惑很可能是巨大而持久的。《你好爸爸》的所有嘉宾都强烈地感到，要做一个合格的父亲，似乎“自己本身必须得是点什么”。“凯叔讲故事”创始人王凯说，如果你不是什么的话，在孩子面前就没有发言权。

心理咨询师李松蔚给许多出现问题的家庭做过家庭治疗，但他同样有作为父亲的困惑。他告诉我，对于他来说，最困难的一点是，他并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足够好，是不是已经从一个儿子成为了一个父亲。“当你是一个儿子的时候，我可以认同自己就是一个有缺陷的，不够完善的，还在成长中的人。但是父亲这个角色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我需要去承认一点：我已经长成了。”

女儿出生时，李松蔚正在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写论文的过程中会思路卡壳，于是会有有一个又一个熬到深夜的晚上。那时候，几个月大的女儿半夜醒来哭泣，他抱着女儿摇晃哄睡，一旁是亮着的电脑屏幕上未完成的论文。“心里很困惑。我在想，如果她懂事的话，她会怎么看待我。我还是一个学生，却好像已经要成为她行为上的榜样。我很希望能够像一个很成熟的科研工作者，知道应该敲出来的每一个字，但是我做不到。我要到自己变成什么样子的时候，才可以有底气地告诉她：你看，这是你爸爸。”李松蔚的女儿7岁了，他依然会时不时地面对自己内心的纠结。

李小萌为《你好爸爸》寻找嘉宾，请他们谈谈对父亲角色的看法。“爸爸”们最常见的顾虑是自责：“我这个爸爸当得根本就不合格。”怎样才是合格的？似乎也没有人说得清：“没思考过这个问题。”好父亲的面目竟是如此模糊。

“当丧偶式育儿成为一种流行语时，媒介起的作用到底是让父亲回归家庭，还是让他们与家庭之

间更加割裂？”李小萌的观察是，“许多新一代爸爸并非没有参与养育的自觉。爸爸和妈妈之间最大的分歧在于，妈妈想让爸爸用跟她相同的方式来爱孩子。但孩子并不需要两个妈妈，他们也需要来自爸爸的，不同于妈妈的爱的方式。在我们抛出一句指责之前，似乎应该更清晰地分辨彼此的角色，而不是在混沌当中只剩下情绪。”

被消解的“父职”

为了理解父亲的角色，我尝试去理解今天的父亲们所处的位置。我找了许多父亲聊天。一位父亲的感受颇具代表性。不像《你好爸爸》的嘉宾，他的工作很普通，收入不足以独自承担家庭的花销。妻子和岳母是照料孩子的主力。他从小是在祖辈身边长大的，和自己父亲的关系并不亲密。他朦胧地意识到，自己应该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某种重要角色，但具体到日常，他并不擅长与孩子相处。他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对于孩子来说，他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当然，在他的妻子和岳母看来，这种“可有可无”是他不作为的结果。

20 年前，意大利心理分析师、国际心理分析学会（IAAP）前主席鲁格·肇嘉（Luigi Zoja）注意到了一种普遍存在的“可有可无”。他的病人里经常有来自单亲家庭的孩子，其中绝大部分人没有父亲。当他关注这个话题时，数据更让他惊讶。20 世纪 70 年代，在美国，由于离婚率的上升，那 10 年里每 10 个出生的孩子就有 4 个注定只能和父亲或母亲生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几乎都与母亲生活在一起。20 世纪末，美国已有一半孩子完全或者部分地与单亲母亲度过童年，未婚生子占总出生率的 30% 以上。即使是在非单亲家庭中，父亲在孩子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再重要。这位擅长史实和社会文化研究的心理学家萌生了一个判断：父亲在孩子成长中起到的作用已经到了历史最低点。

提示语假字假字假字假字假字假字假字
假字假字假字假字假字假字假字假字假字假字
字。



左图：图说假字图说假字图说假

右图：说假字图说假字图说假字图说

2001年，鲁格·肇嘉出版了自己的专著《父性——历史、心理与文化的视野》。在这本书里，他为我们理解今天的父亲划定了一个历史坐标。

以生物学的观点看，父亲与母子共同生活并参与养育孩子的物种，只占整个哺乳类的3%左右。在人类近亲黑猩猩的社会里，除了维护整个群体安全，雄性黑猩猩在具体的后代繁衍中只贡献精子，养育后代全由母黑猩猩承担。

可以说，在家庭中与妻子孩子共同生活并参与育儿，是人类文明演化出来的父性机能。它的出现是因为在一个农耕社会中，需要有一个角色去组织社会合作和斗争，制定和维护规则。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在父权社会中，父亲都是令人畏惧的不可忤逆的绝对权威，他不仅是家庭的领导者，也是教育者及精神支柱。在那样一个完全传统的社会里，我们会认可这样的父亲是一位好父亲：就像《红楼梦》

里的贾政，他有俸禄和田产供养家庭，为孩子选择教师，并亲自把关他们的教育，为他们能够子承父业为官做宰提供经验和资源。

如果我们承认，父亲在生物学上并非必需，与母子关系相比，父子关系更多体现在心理和社会层面，那么，一旦社会与时代发生改变，父亲的角色也容易随心理和社会环境、文化的改变而改变。

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后，一个传统好父亲的职能被逐一消解。教育已经脱离了家庭，取而代之以学校等社会机构。过去，手工艺者、农民以及地主主要从他们的父亲身上直接学习技能。然而，这在一个追求快速进步，不断变化动荡的时代已不再有可能。父亲可能还在渴望他的孩子继续他的职业道路，但极有可能，在一个世代内，变化已经发生，他已经没有东西值得去教，技术进步日益将他的技能变得过时。肇嘉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

欧洲和美国的一代父亲，开始将他们的孩子推向比他们自己的职业“更好”的职业，社会的进步已经比以往更经常地粉碎了代与代之之间的联系。

甚至，孩子的休闲时间同样也不再为父亲保留一定的位置。几千年来，父亲教孩子怎样骑马，几代以来，他们教孩子怎样骑脚踏车。但如今，当孩子们面对的是电子游戏机的时候，父亲已经没有了权威。他很可能无法指导孩子使用电脑。他似乎属于一个过去的不同的世界。

随着20世纪的到来，父亲不再是家庭的精神核心，他沦落为一个“养家糊口者”。

家庭精神生活主角的问题被调换了过来。上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的儿童心理学研究。儿童精神分析研究的先驱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指出，始于婴幼儿期的母子关系是孩子建构所有人际关系的基础。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观察战时幼儿园里的孩子，发现并详细记录了因失去母亲导致的异常，这就是后来为人所知的依恋障碍。此后，英国医生唐纳德·温尼科特（D. W. Winnicott）和发展心理学家约翰·鲍比（John Bowlby）进一步推进了对母亲角色重要性的研究。前者认为，“足够好的母亲”全身心照顾婴幼儿期的孩子，是其健全发展的基础。他并未特别论述“足够好的父亲”的必要性。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鲍比发表了三部有关依恋障碍的著作，此后的研究更明确指出，母子依恋以父子关系无法企及的深刻程度影响着孩子的生存及安全感的建立。

很显然，传统好父亲的光荣岁月已经过去了。新时代的父亲要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他们必须改变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过去，父亲虽然是家庭的核心，但他往往并没有进入养育的日常，而现在，无论是为了带领他们的孩子进入今天复杂而多元的社会，还是为了回应新一代母亲们的平权要求，都需要新一代父亲真正涉足这一领域，并承担更多的责任。然而，在日常养育中，仅仅是理解孩子、认识孩子个性就是无比复杂的工作。

鲁格·肇嘉感叹父亲们的困境：他们在文化上，太年老；在心理上，太盲目。要完成的角色转变是如此之难，“使得许多男人都放弃成为父亲”。“有时他很简单地就不去尝试与他的孩子维持一种关系；在其他的时候，他处于焦虑与恐惧的控制之下，害怕他的孩子会抛弃他。他的行为表现就好像他是那个冒着被排除在外风险的人，他反过来努力去将自

己投入横向交流的青少年世界当中。许多研究告诉我们，父亲最经常与孩子共同进行的‘活动’就是看电视，而这就是背后的原因。”

鲁格·肇嘉对于父性的研究基于西方的历史文化和传统，但不难看出，在现代性面前，中国的父性与西方的父性是被一起扫荡的。而且，中国社会的变化如此之快速剧烈，我们对于父亲这个角色的要求，可能仅仅在两三个世代间就发生了巨变。

以情感支持为例，心理咨询师王雪岩说，现在我们认为男性为妻子和孩子提供的支持，很大一部分是情感支持。可是，早两代的父亲，“经历了连续不断的战争、运动，当人与人之间的最基本信任都有危机的时候，情感支持就成了奢侈品，在他们那个时代的评价体系里，并不是重点”。

李小萌记得特别清楚，她30岁之后有一天回家，她爸爸说：“宝贝女儿回来了！”她心里一惊：天哪，我爸爸有了这么柔软的表达！小时候，爸爸对她的评价总是充满了否定。她曾听见爸爸对妈妈说：“我带小毛参加活动，人家小姑娘都跟花蝴蝶似的，咱们女儿又黄又瘦缩在角落里。”“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她还记得刚上小学一二年级，自己老在学校主持学校活动，就有点“飘飘然”，自我感觉特别好。“我爸兜头一盆冷水：怎么那么轻浮！”



后来做《你好父亲》，李小萌发现，这样的创痛比比皆是。潘长江终其一生都没有享受到父亲自然流露的赞美。60岁的人，说起来，还眼泛泪光。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说，他爸爸一辈子没对他笑过，直到他儿子出生，才看到爸爸的笑脸。令李小萌印象最深刻的是，蔡国庆一开口就说：“当我知道我妻子怀孕的那天，我爸就在，我就指着我爸爸的鼻子说，我绝不要成为你这样的父亲。”从小，蔡国庆的爸爸以冷酷的、令他尊严扫地的方式训练蔡国庆学声乐。有时候，他在练习时发现父亲好像睡着了，停下来不唱，父亲睁眼一脚把他踹到一边。

现在人们开始批判父亲缺失的危害，但这种缺失其实一直存在，只不过被过去的社会文化默许着。王雪岩记得，她的父亲在谈到他们那个年代的时候曾说：“如果哪家生了孩子，当爹的是不敢明目张胆地抱自己的孩子的，那会被人笑话，实在想抱了，也只能关起门来，偷偷抱。”

左图：图说假字图说假字图说假

右图：说假字图说假字图说假字图说



李小萌问过她所有的嘉宾一个问题：你最早的跟你爸的互动发生在什么时候？很多中国爸爸答不上来，有的人说到了七八岁才有印象。只有加拿大爸爸夏克立的描述最细致：“大概是两岁多的时候，我和爸妈在一个游艇上，他们投放了一个小气垫船，拖个绳，把孩子们都放在那上面。”他还有一个模糊的印象，爸爸会陪他堆出一人高的沙子城堡。这么看来，夏克立有与女儿玩耍的天赋并不偶然。

为了让夏雨上节目，李小萌好几次劝说他。有一次，夏雨特别严肃地和她说：“小萌，我觉得我不适合你这个节目。因为你要讲的是父亲、父爱。我现在30多岁了，和我爸一起相处的时光不超过两年，我没有这方面的东西可讲。”包贝尔的父母离婚了，谁也不管他，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他说：“我为什么能演喜剧？我那时候去同学家——‘阿姨，你真漂亮！’阿姨高兴了就会烧红烧肉给我吃。”所以他从小就知道要让人开心，讨人高兴。

英国发展心理学家约翰·鲍比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儿童时与父母交往的经历使个体形成了有关自我与他人的“内部工作模型”（Internal Working Model），这种模型将成为个性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一内部工作模型的“指导”下，人们即使在成为父母前就已经“知道”学习其父母的角色，存在着一种扮演其父母角色并重复自己儿童经历的趋势。

很显然，很多新一代父亲很难从父辈那里学到符合当今时代期许的为父经验。一个“70后”父亲来参加李小萌的活动，讲了他的痛苦：对待孩子并不是不爱，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父辈对待我们的经历，让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爱孩子。我们不习惯跟自己的父亲亲密。”有一段时间，这位父亲在晚饭后带女儿散步。女儿很喜欢牵他的手或是拉他的袖子，可他会条件反射地甩开。女儿说：“我就是想拉你一下，抱你一下，你为什么这样？”这位父亲说，他意识到了问题：养育孩子，光有人生观、价值观远远不够，他需要学会爱的表达。他去学习，去改变。“我现在改得差不多了，但这个改变的过程，真的太痛苦了。”

未被看见的彼此

从历史的进程回到当下的现实，如果我们深入到家庭的日常，我们对父亲的角色又会有什么认识？

出现在李松蔚咨询室里的家庭，一般都是因为



孩子出现了“问题”而来的。可是在他看来，很多问题并不真的是孩子的问题，而是父母之间没有办法沟通，不能正确处理一些情绪，借助孩子表达了出来。

做家庭治疗，李松蔚一般都要求全家人一起参加，缺一不可。他观察到，在咨询室里，“父母双方的表现往往就像网上的吐槽和段子一样：妈妈是热情的，投入的，坐在孩子身边，表现出强烈的关心。她是这个家庭的发言人，大部分时候都是她在说话，不时地给爸爸一个白眼”。“爸爸也配得上这个白眼。他总是坐得很远。除非问到，否则从不主动开口。”

这些表现似乎称得上“丧偶式育儿”的比喻，但是，“丧偶”传达的信息是：“父亲是不存在的。”实际上，爸爸的沉默并非代表他不存在，他始终存在，而且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表态——“事情哪有那么严重，不值得每个人都扑上去”；“我的意见根本得

不到你们的认可，我不如躲远一点”；“你们的生活方式我不赞成”；“养孩子的事我不懂，我只管好好工作，给你们多挣钱就好”。

李松蔚遇到过很多困惑的父亲，他们开车回家，会在车里坐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抽一会儿烟。或者原本可以下班就回家，但他们会约个人喝点，找几个人打牌。因为他回去之后，没有办法承担来自家庭的很多情绪和情感。“他在家中无话可说。可能有的时候，他想要做点事情，妻子会挑剔；想跟孩子玩一下，会发现孩子跟他也不亲近。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只需要负责赚钱。”

李松蔚发现，许多妈妈看不到这些父亲的无声表态。她们总是说：“他随便……”“他在不在，反正都一个样。”“男人有什么用？”这些抱怨存在的悖论是：妈妈们“一方面抱怨对方没有存在感，一方面又拒绝看到对方的存在，甚至不愿意坚持让对

左图：图说假字图说假字图说假

右图：说假字图说假字图说假字图说



方留下来，反倒挥挥手送他离开。以至于我们已经分不清：究竟是他们的远离导致她们的抱怨呢，还是她们的抱怨导致了他们无法回归？”

上世纪 70 年代，心理学家开始对父亲教养投入较多的精力。此后大多数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父亲教养投入对于孩子发展的影响。这是人们开始呼吁父亲回归的知识基础。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研究者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家庭是一个系统，父亲不是孤立的一分子，他不断主动又被动地与其他家庭成员发生互动。到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许多研究者发现，父亲们已经有了更多的投入到孩子教养活动中的意愿，但是他们的实际投入水平依然有限。此后的许多研究者把目光集中在父母关系的互动上，被提出的新理论之一是“母亲守门员效应”（the Effect of Maternal Gatekeeping）。

母亲守门员效应认为，在父、母、子三方组成

的核心家庭中，母亲是孩子的主要照料者，在家庭中居于中心地位，母亲们把家庭当作自己的私家花园，在四周建起高墙，把家庭劳务及与孩子相关的事情当作花园里的花草树木，她们在唯一的入口处检查“园艺工”父亲的入园资格，并负责组织、监督、规划、委派父亲教养孩子的活动等日常工作。该理论认为，当女性在承担母亲这一角色时，会形成两个身份认同标准，一个描述其对自身的期望和要求，另一个描述对配对角色即孩子父亲的期望和要求，这两种身份认同标准同时对自己和配偶的角色的行为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有可能是消极的，阻碍了父亲参与教养，也可能是积极的，能够促进父亲的投入。

上海女作家毛利在公众号上写家庭情感类的文章，总是会遇到抱怨“丧偶式育儿”的读者。“她们提起来会很愤慨，有时候我就建议说，你要给爸爸一点机会。可是她们并不肯，抱怨说丈夫就是没用，

男人天生不会带小孩。”毛利说，“好像女性会很渴望那种万能的，不需要教，也不需要沟通的丈夫。但其实，我们会看很多育儿书，男性也是在摸索着当父亲。现在大家经常说，女性正在找到各种方式，打破职业上的偏见。我觉得女人是不是也要给男人一个机会，让他打破家庭里面对男性的性别偏见？”

毛利的丈夫陈华棕过去常年在外地工作。在儿子矮文出生的头三年，他都属于候鸟式的父亲，平均一个半月来上海一次。毛利说，自己是独立女性，当年产检都是一个人来来去去。儿子降生之初，她认为，有自己的父母帮忙，带孩子的事情用不着丈夫。但事实是，带了两年孩子之后，她绷不住了。陈华棕告诉我，最早，他并不觉得自己在外地工作有何不妥，慢慢地，他感到妻子对自己的缺位多有抱怨，两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这才开始尝试改变。为了缓解矛盾，2016 年，他接受了一份在杭州

的新工作，实现了每个周末回家陪孩子。但很快，新的问题出现在家庭面前：矮文需要开始准备幼升小的择校，而且随着孩子逐渐长大，老人们已经“压不住他”，谁来主持孩子的教养大业？2018 年 3 月，毛利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宣布，她“雇佣”了陈华棕在家里做全职父亲，每个月支付工资 2 万元。

做这个决定，母亲需要的不仅是养家的经济实力，也需要勇气和魄力。亲戚的问询像刀子一样：“大男人整天待在家里干吗？小孩上幼儿园了还需要陪吗？前两年他没辞职，小孩不是也养得蛮好啊？”很快，小区的大妈们也知道了消息，闲话不可避免。“但小区的人还是友善的，他们至少不会当着你的面说不行。”毛利告诉我，“我在公众号上写全职父亲工作报告之后，前几期一直有读者发来长篇大论，告诉我这么做绝对不行。”

作为一个“守门员”，毛利也不是一开始就能接受丈夫主导自己的花园的。“原来我也觉得，他照顾小孩的方式和我完全不一样，不靠谱。”矮文还不满一岁的时候，陈华棕把他直接扔进浴缸里游泳。孩子哭得厉害，他不准毛利把他捞起来，说这是一个锻炼，习惯就好。教矮文骑自行车，陈华棕说放手就放手。孩子一路摸爬滚打。小区的大妈都看不下去了：“爸爸心硬呀，小孩一头栽到绿化带里去了，我看他就站在外面，一动不动。”但也就是这样的爸爸，会带着矮文粘知了、抓蜗牛，在网上买蟑螂喂壁虎。陈华棕说，自己之所以能安于这个角色，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能够全权负责孩子的养育，妻子对他的决定给予了足够的尊重。

毛利告诉我，其实直到如今，她依然不能理解丈夫的很多育儿方式。她时常觉得陈华棕对孩子有时候太严厉，但她不会用抱怨挑剔的态度去看待这种严厉。“星期天的公园里，好几个爸爸带着小孩，显而易见，是为了给妈妈放假，歇一天。这些爸爸跟我一样，只做点零碎边角料工作，带小孩在公园捞捞鱼，捉捉蝴蝶。随心所欲地带着，小孩想吃冰激凌去买，想吃糖就吃，绝对不为难自己也不为难孩子。你心里也明白，这是野生动物的养法，交流全靠诱饵。家里总还是需要一个人，把这只小动物，慢慢教养成人。”

如果只讨论母亲的守门员角色，强调母亲的主动性，显然存在许多不公。在李松蔚看来，那些充满抱怨的母亲，她们背后的焦虑也同样未被父亲们看到。“中国的女性在性别角色上比男性承担了更多



说假字图说假字图说假字图说

广告

李文贤会花两个小时陪女儿。胡苏敏能够利用这个时间，把一日三餐配好。孩子玩痛快了，她上午的时间也能够轻松一些。妻子辞职的时候，李文贤去找自己的老板谈，提出每周五在家办公，承诺绝不影响工作。于是每周五早上从起床到10点钟，胡苏敏有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一个人的时间。每天晚上，洗碗筷的任务是爸爸的。每个周五晚上，夫妻两人会讨论周末的大致安排，让彼此都有机会喘息。李文贤有一句话：在刚结婚没有孩子的阶段里，我们更像是两个合法同居的单身人士，并没有太多合作和彼此分担。在独立带娃的路上，每天太多的细节需要合作，讨论，彼此帮助。我们完全离不开彼此。

胡苏敏告诉我，有一段时间，她曾经觉得自己真厉害，居然这么快就适应了全职妈妈的生活，一直积极、努力、开心。“快到一年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良心发现’：如果不是我先生实实在在地把早上、周五、周末的时间安排出来，承担包括晚上洗碗在内的很小的事情，如果他不坚持哪怕其中一件，我可能就顶不住了。”

“两个人相处久了，容易把对方的付出视作理所应当，你必须睁开眼去看一看。”胡苏敏总在发现这种付出。“从前让他做一个家务，他可能会拖上几天，现在几乎立刻就会执行。”有时候她晚上想去健身，只要提出来，李文贤都会努力早点回家。“这件事好像简单，仔细想想其实不简单。”李文贤每个月都会按时给妻子发“工资”。胡苏敏刚开始不以为然，直到有一次，“工资”暂未到账，银行卡绑定的基金定投扣款失败显示余额不足。“很奇怪，心里真有些不是滋味——没有收入，似乎被社会抛弃啦？好在老公帮我想在前面，不然多受几次这样的刺激，我会不会崩溃？”

李文贤说，他有一个梦想，希望自己的人生中也能有一个阶段做一个全职爸爸。“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有点像一个间隔年，我能够重新理清我的生活，也可以看着自己的孩子每天的生活，然后观察她，留下一段很亲密的回忆。”我问他，希望在女儿的心目当中，他是一个怎样的爸爸？“我希望她能从我身上看到，生活是很有意思的，可以去享受的。她能充满安全感地去探索外面的世界。如果有一天她需要，她也永远可以回到我身边来。”

爸爸在哪儿？中产阶级的育儿博弈

主笔 / 杨璐

婚姻里也得有合伙人精神，夫妻双方共同跨越中国式家庭内的各种育儿门槛，达成一致，并且符合孩子的期望。

“消失的爸爸”

“我又独立又好看，家里的事情基本全是我做。我干吗还要个男人。我是不是有病。”得知我在做一个关于爸爸在育儿活动中缺失的选题，我的朋友小江给我讲了一个她和丈夫某次大吵之后的感慨。我作为一个未婚女性，觉得她说的好像是挺有道理的。对呀，为什么需要一个“消失的爸爸”呢？

一个传统的思路是缺少爸爸的关怀和教养，孩子的心理健康会有风险，人生可能走上歪路。以美国曾经的首富盖蒂家族的绑架案为原型的美剧《信任》里，约翰·保罗·盖蒂（J. Paul Getty）苦恼于儿子和孙子都染上了毒瘾。他十分困惑地问医生，人们为什么会吸毒？医生说，他们总想弥补人生中的不如意。老盖蒂说，不如意？我的孩子拥有一切。医生说，这里更多指的是感情失意。

盖蒂和儿子们的感情十分淡漠甚至冷酷。他和情妇们住在一个空荡又豪华的庄园里，还养了一只宠物狮子。他的一个儿子自嘲父亲根本不认识他，说他是家族的耻辱，另一个儿子已经两年没有跟父亲讲过话。当他的孙子被绑架时，老盖蒂甚至拒绝支付赎金。对话虽然是艺术创作，但有些育儿书中确实把吸毒作为缺少爸爸陪伴和关怀的一个极端后果，其他更常见的现象是学业不佳，情感表达欠缺，性别意识弱，长大后会受到缺乏自信、焦虑、孤独等心理问题的困扰。

如果有这么严重的后果，任何一个心智正常、对孩子的未来抱有期望的爸爸就应该投入到抚育和教养中来。中国第一个关于父亲参与育儿的专项研究是在2006到2007年进行的。研究负责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家庭研究中心秘书长张亮说，当时刚好跟美国学者有一些合作，讲到了父亲参与研究。我们检索了一下文献，中国基本上没有专项的关注。

为什么中国不重视父亲的角色呢？

作为一个婚育旁观者，我也觉得很奇怪，“丧偶式育儿”的话题由中产阶层爆发，而这个阶层既力争上游，又重视教育。爸爸们放任孩子未来出现心理问题的风险和妻子们的抱怨，消失了？我觉得有点儿反常，中产阶层的家庭里，爸爸在哪儿呢？爸爸在做什么？

真实的婚姻里也不是简单的“风险—避免风险”的关系。如果对照着“丧偶式育儿”话题下妈妈们的吐槽留言，小江的丈夫做得其实相当不错。小江和丈夫都生长在关系很和谐的原生家庭，两家的父母都有不错的工作，夫妻恩爱。她和丈夫在北京也都各自有一番天地，两个人既是生活上的伴侣，也有能力给对方关于事业上的理解和建议。怀孕之前，两家老人和夫妻俩能玩到一块儿，家庭旅行不止一次。怀孕之后，丈夫虽然在创业，但只要能抽出时间，一定陪小江去产检。小江说，能够感受到老公非常期待这个孩子的到来，期待成为爸爸。

女儿出生，矛盾就来了。小江说，她睡醒之后，看见丈夫在给女儿换尿布，心里有一点点失落，觉得自己被剥夺被忽略了。从此以后，母爱笼罩了一切。3岁之前，女儿几乎可以不需要父亲。小江说，那个阶段孩子的主题是活下去，她需要母乳，需要安全感，这些都是妈妈给的。连穿衣服，布料是软一点还是硬一点，都只有妈妈才分辨得出来，爸爸不懂这些。女儿20个月大的时候，夫妻俩去日本旅行，小江把孩子从头抱到尾，等于每天负重20斤暴走在街头，又要照顾娃又要查攻略。“爸爸可以跟女儿玩，画大花脸，可是哄睡、吃饭、求抱抱，必须找妈妈。”小江说。

本来就是小江自己扑出去的，女儿也更需要妈妈温暖的怀抱，还有什么对爸爸不满意呢？“不满意。”小江说，半夜喂奶，丈夫也起来帮忙，有时候明知道丈夫不会做，故意不告诉他。看着丈夫手忙脚乱不得要领，心里就会暗爽。都说夫妻共患难，可在生孩子这件事上，妻子承受着身心的考验。小江说，生完孩子之后，每个进来的人好像都能撩开衣服看看她有没有奶。整个过程觉得自己已经不是



左图：图说假字图说假字图说假

右图：说假字图说假字图说假字图说

一个人，而是一个器官。她患上了产后抑郁症，作为在照顾女儿上有权威地位的人，在月子里挑剔所有人。小江说，她怀孕时就了解了一下产后抑郁的知识，跟丈夫有应对的约定。按照小江的预案，丈夫把四位老人叫到一起，科普产后抑郁症的知识，告诉家人们“忍她这一年，幸福一辈子”。

吵翻是在接连两次旅行之后。“我在沙巴发烧了，等我退烧醒来发现丈夫一直在我旁边照顾。我问他为什么没有带着四位老人和孩子一起出去玩。他说，因为孩子也发烧了，在另外的房间被老人们照顾呢。我当时就发火了，问他为什么不把我喊醒，告诉我孩子发烧了。”小江说，孩子出生之后，她曾经发誓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换孩子健康平安，自己发烧不重要。可是，她老公则是直男思维的一脸发蒙，理解不了小江内心的百转千回。他一直在照顾小江退烧，催医生赶紧到，打电话给保险公司，忙活了一圈，老婆却生气了。

从沙巴到香港，丈夫没有做行程攻略。小江说，从前攻略都是她负责，可出发前因为一直加班，就让丈夫准备。小江又想到，那段时间丈夫每天晚上

在看《白夜追凶》到凌晨 2 点，又是怒从中来。小江说，她后来才知道，丈夫打算让全家放松地逛上两天，所以没有既定行程。看电视剧是因为被她的产后抑郁搞得失眠了。可当时，小江吵得差点要离婚。

中产家庭的结构

中国有“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西方文化里也一直把父亲看作是养儿育女的局外人。他承担的是工具性的角色，比如勤奋工作，作为经济上的提供者。在美国中产阶层蓬勃发展的上世纪 50 年代，公司甚至把妻子是否做好一切后勤工作，以便丈夫可以全身心投入公司堪称雇员们的一项职业素质。1951 年美国《财富》杂志做过一项调查，有一半的公司对应聘者的妻子进行筛选，有家公司大约有 20% 的候选人因为他们的妻子而没有被选中。别说带孩子这样的刚需家务，对妻子的要求还有在以丈夫的公司为中心的社交中应对得体，进退有度。

学术界曾经也有理论来支撑这种“局外人”的现象，并且它们至今在人们的育儿观念中发挥着作



用。张亮说，首先是心理学领域，早期认为父亲在影响儿童发展方面没有母亲重要。最主要的两个理论家，一个是弗洛伊德，他认为婴儿与母亲的关系对孩子后来的性格和社会关系具有重要影响，父亲的地位要到了童年期方能体现出来。另一位是人种学家约翰·鲍比尔，他强调母亲是儿童早期发展中的核心人物，而且核心人物只有一位，因此父亲只能成为次要角色，最多对母亲起支持作用。

生物学的观点也是现在时常能够听到的，解释父亲成为局外人的理由。早期生物学家认为父亲不适宜对育儿工作作出积极贡献。他们在实验室环境下对雄猴和雌猴的观察表明，雌猴对幼猴表示抚育行为的可能性是雄猴的 4 倍，雄猴把幼猴当作客人的行为是雌猴的 10 倍。还有生物学观点认为，女性的育儿倾向是因为妊娠和生产中的激素变化，男性

没有这些经历，所以从生物学角度讲他们不具有育儿倾向。

“父亲缺席”在西方被关注和研究是有现实原因的。张亮说，上世纪 20 年代末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和“二战”，使大批男性在战争中失去生命或者入狱多年，很多家庭出现了没有父亲的现象。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西方出现了多元化的家庭形式，比如离婚、同居生育等，并且很多单亲妈妈是贫困阶层或者少数族裔，这就成了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除了这些以外，随着女性就业率增加和女权运动的发展，西方社会对父亲角色有了新的期望，比如从心理上和经济上做好迎接新生命的准备，以合法婚姻保障孩子的成长，从怀孕开始跟母亲共同分担孩子心理和生理上的照顾养育等。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强调父亲能够而且应该是养育性的，他们应该积极参与孩

子的日常照顾。学术界还出现了一些新概念，比如新父亲、现代父亲、养育父亲等等，指的都是父亲不能扮演单一的角色，而是多重角色，是同伴、照顾者、保护者、榜样、老师以及经济提供者等。

刘女士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她说，美国从前虽然也是“男主外，女主内”，现在的观念已经是夫妻双方共同撑起这个家。美国家庭通常有两到四个孩子，日常的状态是夫妻分工协作。比如说实行弹性工作的公司，父亲早上5点就去上班了，下午4点钟就可以下班回家管孩子。学校在下午3点多放学，有男孩子的家庭通常会由父亲带着训练棒球和橄榄球。孩子年纪小的，每周会安排一到两次训练，周末会打比赛。棒球比赛打一天，足球和橄榄球加上训练的话需要三个小时，这些时候爸爸都是在场的。

除了橄榄球还有童子军。童子军通常每周都有一次聚会，每两周有一个大活动，比如带着孩子们做一个信箱，做完手工之后又在旁边踢球或者打橄榄球，有时候会去公园露营等等。每年还有两三次大的活动，比如爸爸带着孩子参加赛车，这个赛车活动大概要持续一个月，然后二三十个童子军再进行比赛。刘女士说，美国中产家庭的状态就是，放学后过了一个小时的时候，街上常常见到父亲的身影，带着一个到三个男孩练棒球，扔投掷。

虽然中国网络上“丧偶式育儿”很流行，可长期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家庭里遵循了美国中产阶层的家庭模式。刘女士说，说实话在美国的行程太满，父母只有一方管孩子是忙不过来的。中国父亲也要陪着打棒球、练跆拳道等，当教练的程度可能没有本地美国人那么高，但是跟在中国生活的情形相比要强多了。“当地华人在这方面是有共识的，所以如果要去外州工作，也都尽量带着家庭。甚至极端情况，妈妈带着孩子在美国生活，爸爸在中国，日常也要通过视频沟通情感、辅导作业，到了假期父亲和孩子就要聚在一起。”刘女士说。

其实在中国，重视教育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也有承担类似的角色。刘女士最近要在中国工作一段时间，孩子也来北京上学。在考察国际学校的时候，她留意到很多需要家长的场合都是爸妈一起出席的。“我看到父亲们拎着公文包，说明在学校处理完事务还是要去上班的。”刘女士说。有的父亲参与得更多。李一慢是育儿KOL，从2007年开始在博客上分享育儿心得，很快就达到了百万的阅读量，也是各大网站、

育儿杂志上的专栏作家。他为了写专栏曾经访谈过70多个爸爸，他们都是对育儿有经验和心得的。“中国育儿方面是妈妈投入得多，但不能说爸爸就没有。”李一慢说。

李一慢家的餐厅里有一个黑板，每天晚上他先吃完饭，利用儿女们吃饭的尾声和喝酸奶的十几二十分钟，讲一个文史小课。这个形式对儿女虽然轻松无负担，背后却是李一慢大量的案头工作。他把所有中学和高考里选的散文、古诗词和文言文进行题材和作者的统计，根据数据编排出他自己的课程。到了假期，他根据孩子们学校的课本内容安排游学。“今年寒假我们刚去了宣城、滁州和济宁。宣城有一个敬亭山，我们全家都喜欢李白。李白有《独坐敬亭山》，滁州是因为儿子马上要学《醉翁亭记》，济宁是因为初二的必读名著是《水浒传》，我们要去梁山看看。”李一慢说。他还专门把自己游学的路线、设计思路和对孩子的价值等内容出了书。

爸爸的门槛

在香港吵完架，小江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觉得跟丈夫的沟通出了问题。夫妻俩深谈了一次。“老公跟我说的话，我现在还记得。他觉得很茫然，不知道要怎么做。怕万一做得不对，会对孩子不好。”小江说。经过怀孕40周的朝夕相处，女儿从出生开始，母女俩就结成了亲密无间的组合，这是爸爸没办法替代的。当孩子哭或者笑的时候，一定是妈妈最先感知到这些。丈夫虽然看到了小江的辛苦，却只能干着急，帮不上忙。找到了这个症结，去年的日本旅行，小江就特别开心。出门前，她进行了仔细的分工，她的工作是规划路线，订机票和酒店，丈夫的工作是陪孩子玩，扛行李和扛孩子。丈夫发现妻子和女儿很信任他，就事事上心，甚至表现超过预期，给了小江惊喜。

男人真的像早期心理学和生物学理论所说，本质是育儿的局外人，只不过因为中产阶层的家庭模式才被拉入育儿界的吗？

只要有机会和方法，小江的丈夫同样可以把孩子带得很好。学术界其实也早有研究挑战“父亲在育儿上比母亲稍逊一筹”的观点。张亮在《父亲参与研究：态度、贡献与效应》里引用了儿童心理学领域有很高声誉的学者罗斯·帕克的系列研究，比如父母用奶瓶喂养婴儿并测量牛奶的消耗量。得出



图说假字图说假字图说假字

的结论是，性别之间的生物学差异有可能使得男人和女人以不同的方式实施育儿活动，但是男人和女人都是有能力的抚慰者，而且两者的抚慰具有相似性。迄今为止，其实没有一种理论能够证明父亲的育儿只处于次要地位的假说，父亲完全有能力抚养孩子，甚至是幼小的婴儿。

阻挡父亲育儿的门槛在哪里呢？覃宇辉毕业于武汉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是中国心理学会会员和在北京执业的心理咨询师。作为一个心理学专业的年轻男性，他觉得从男性自身的原因来看，很多人是因为动摇了男性的自我认同。要悉心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就得展现出柔情的一面，如果平常的自我认同是“铁血硬汉”，那么超我会对柔情的一面发起强烈攻击，这些婆婆妈妈算什么大男人。

这种对“铁血硬汉”的暴击不仅在中国，欧美也有。“我看到资深记者David Worford的文章，他就提到一个古老的误解是家庭奶爸不够有男子气概。

而且最近这五年，像福布斯这样的媒体讨论过奶爸综合症，觉得不能让丈夫待在家里看小孩。”覃宇辉说。只不过跟中国的情况相反，欧美是因为对超级奶爸的态度更接受，才引起了阳刚之气的讨论。覃宇辉说，美国招聘网站careerbuilder.com2008年做过调查，发现超过37%的男性表示，如果家庭的收入稳定，愿意辞掉工作在家带小孩。有42%的男性表示，愿意降薪10%甚至更多，留出时间来跟孩子相处。

进入父亲角色也是一道门槛。李一慢家有一整面墙的书架上都是育儿和对孩子成长有益的书籍，他在培养一双儿女上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即便如此，他说，真正对育儿这件事感兴趣是在老大2岁的时候，儿子跟他有了互动。“女人可能是在怀孕那一刻就开始母爱荡漾，爸爸真不是。孩子在2岁前跟妈妈是一体的，他在妈妈的怀抱里，妈妈去哪儿他去哪儿。他没有自主意识，也不知道爸爸是谁。2岁

之后，他抬头看到了世界，对爸爸有了反馈。爸爸开始被小屁孩需要了，更容易进入角色。”李一慢说。

男女性别的差异能给孩子不一样的乐趣。李一慢说，他儿子最喜欢举高高、骑大马，这些肢体上的活动让他很兴奋。妈妈没有这个力气，所以孩子就越来越找爸爸。从这些简单的游戏开始，随着儿子的成长，父子俩又发展出爬楼梯、爬山、踢足球、游学等等亲子活动。李一慢的车里永远放着足球，只要有时间就跟儿子玩。这种被孩子的需要让他在父亲角色上越走越远，植入到心里去了。到了养女儿，李一慢说，他没有女孩的成长经验，也想办法既让孩子高兴也培养孩子的眼界。他作为一个直男，是不爱逛商场，但经常陪着女儿去逛，并且每次必须让女儿买一样东西，培养她的审美和女性生活经验。他还专门带着女儿去吃北京出名的下午茶，这种女性化的活动有时候太太都不参加，他独自带。

也因为父亲进入角色需要一个亲密接触的过程，妈妈有时成了父亲和孩子之间的“守门人”。家庭系统理论认为父亲在参与孩子教养时，母亲是否给予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有实验观察 300 名母亲的态度对于父亲与 3 到 5 个月大的婴儿的相互作用的影响，发现母亲对丈夫的育儿技能、参与活动感兴趣和对父亲参与水平的评价，都对父亲的参与工作产生影响。

张亮所做的专项研究里也发现了母亲成为爸爸育儿障碍的现象。她说，妻子一方面抱怨丈夫不参与照顾孩子，但实际上她们更看重丈夫的工作角色，也就是说她还是认同丈夫先把工作做好，把收入提高一些，然后再来做带孩子的事情。比如，现实中怕婴儿影响爸爸休息，一般是妈妈带着孩子睡，或者是月嫂、老人陪着，这潜意识里都是认为爸爸的工作最重要，实际上把父亲推出门外了。

我们的文化里也总是怀疑男性的抚育能力，认为妈妈在孩子问题是权威。“一个新手妈妈，刚开始也不太会抱孩子、换尿布，但我们文化里认定这些是妈妈必须会的，现在不会慢慢学习就好了。相反，约定俗成认为爸爸做不好这些事是正常的，不会像对新手妈妈一样去鼓励他练习，让他也有机会变得熟练。”张亮说。即便夫妻俩都参与到育儿中来，很多时候会遇到意见不一致的情况，张亮说，这时候女性就掌握着话语权，认为自己是对的，丈夫跟我不一样就是不对的。批评丈夫的行为，也会打击男性参与育儿的积极性。

跟西方的“守门人”相比，中国还有一项特殊国情是来自祖辈的障碍。奶奶或者姥姥帮忙带孩子当然可以减轻年轻父母的压力，但很多时候也在无意识中把母亲排除在外了。张亮说，中国老人经常会认为到儿女家就是帮助带孩子的，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放心去工作。“我们在跟父亲做访谈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很困扰。他们也表达了自己想要跟孩子一起互动，享受亲密时光，但很多时候是被排除在外的。”张亮说。

作为女婿和儿子，李一慢也很理解这样的场景。他说，有的家庭好不容易妻子要给丈夫布置一个带孩子的任务，比如去楼下超市坐一会儿摇摇车，丈母娘对女婿客气，妈妈心疼儿子，这时候老人就站了出来：“你休息吧，我带着去玩。”李一慢深度参与育儿，他甚至尝试突破妈妈和姥姥对孩子的无微不至。李一慢说，他写过一篇文章《造妈妈的反，革姥姥的命》，因为女性不但担心爸爸带不好孩子，还会担心孩子磕了碰了，就变成这也不可以，那也不可以。孩子会变得胆小，不敢往前冲。“我在讲座里放过一系列照片，拍我儿子 3 岁时爬个斜坡。他当时爬到一半就没力气了，这时候姥姥就想上前把他抱上去。我拦着。儿子最后花了好长时间，爬得满头大汗爬到顶上。那个兴奋是有人替代他完成不能比的。”李一慢说。

妈妈的期待

现在如此强调父亲的在场，父亲角色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到底有哪些作用呢？心理学在涉及到亲子关系、原生家庭等问题时经常会讲到依恋理论，拥有超过 4200 小时临床咨询经验的美国加州执业心理咨询师朵拉陈说，之前都说父母，特别是母亲跟孩子的依恋关系特别重要，好像它能够影响一生。然而，去年底召开了一个关于 21 世纪依恋理论与研究的国际会议，综述了近十年来的变化。很多研究都指向一种发现，父母和孩子形成的这种稳定的依恋关系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孩子身边有没有这样稳定的依恋对象。比如父母没办法在孩子身边，但如果有一个奶奶或者老师也能够给孩子提供不断的、稳定的安全感。

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里，父亲参与育儿的程度很高，但并不意味着有强制性的因素要求“父亲在场”。朵拉陈说，美国家庭的形态很多元，比如单亲

妈妈、两个父亲、两个母亲，甚至是多边家庭，所以，父亲和母亲需要同时在场才能给孩子健康成长环境的观点受到很多挑战。那些需要父亲带领的活动，或社区的体育活动是有教练的，或者在她生活的郡里有退休的人做志愿者，带着孩子们玩耍。中国的育儿理念里强调父亲在场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对儿子或者女儿树立性别意识有重要作用。最新的观点却认为性别本身要有弹性。朵拉陈说，美国现在去除性别刻板印象的浪潮很高，在美国，至少是加州这样比较开放的地区，如果说要培养一个男孩的男子汉气概，很多人会质疑到底什么是男子汉气概。

有趣的是，张亮做完父亲参与的专项研究，终于搞清楚为什么美国学术界出了很多成果的领域，在中国却是一个边缘话题。张亮说，美国的情况是，很多家庭真没有父亲。比较而言，中国的离婚率低，未婚生子更少，中国的父亲一直是在场的。他首先是个养家者的角色，给孩子提供经济支持。中国人爱说“养不教父之过”，他们调研时发现，在辅导孩子学习、升学择校方面，很多父亲一直是在场的。

张亮说，妈妈们在网上的吐槽最近几年才出现，这跟社交媒体有很大的关系。这些妈妈更多的身份是受过高等教育、城市里的中产女性。钱岳是社会学博士，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她说，美国等国家从丈夫在外工作，妻子做全职主妇为主流，逐渐发展成妇女进入劳动市场，这是第一次性别革命。研究者会发现，这时候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越可能不结婚或者更可能离婚，同时生育率也变低了。

这是因为女性角色改变了，男性角色并没有变化，就产生了很多矛盾，家庭就变得不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想家庭越来越稳定，或者说大家愿意结婚生孩子，就需要男性去改变，也就是第二次性别革命。“那种家务劳动分工比较平等的国家，它的生育率其实是相对高的。发达国家和地区里有一种是超低生育率，中国香港、韩国、日本都在这个行列。”钱岳说。

钱岳因为主要做的就是婚姻家庭方面的研究，热心在社交媒体上推动大家对婚姻里权利平等的关注。她说，父权社会即使女性在外工作，跟丈夫赚同等的钱，回到家里，丈夫还是觉得自己是一家之主。这是一种结构性的不平等，在这个大环境里，女性想寻求家里的平等不容易。“丧偶式育儿”常被吐槽，丈夫和妻子都在外工作，妻子还要承包育儿和家务就是一种不平等。除了分工不均，丈夫对妻子提出

的改变，比如说分担育儿或者家务表现出消极的回应和态度，也是一种不平等。还有一种隐蔽的状况是，总是妻子在发号施令，丈夫只充当执行者，经常出现妻子指挥到发火，丈夫却觉得很委屈。钱岳说，计划和安排本身就是一项全职工作，无论亲密关系、人际关系，或者工作关系，分担任务不应该只包括“做”的部分，也应该分担安排和计划。

跨越家庭内外的种种育儿门槛，让夫妻双方达成一致，需要婚姻中的智慧。李一慢说，前提是夫妻感情没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看到妻子带孩子劳累，男人是不会那么冷漠的。他的经验是孩子在 2 岁之前插不上手，就赞美太太和多干体力活。

李一慢懂得男人的思维，他在讲座里还交给妈妈们如何“挖坑”把爸爸们拉进育儿中来。他说，父爱是后天的，会觉得多个孩子很麻烦。角色进入得越晚，开始越来越困难。妈妈就要给爸爸任务，比如男人回家开始玩手机，让他带着孩子花钱去，坐个摇摇车，买个小玩具。任务一定要简单明确，男人内心会判断难度系数。让去陪着练跆拳道可能一听就晕了，去逛个商场半小时、20 分钟就买回来了，他就会去做。有了开始，得到孩子的反馈，逐渐就越陷越深了。

女性也有自己的经验。小江说，孩子的好奇心和勇气是孩子爸爸给的。爸爸无论教东西还是玩，都很专注。妈妈就一会儿问饿不饿，一会儿问喝不喝水，打断孩子的专注度。“女儿第一次吃多春鱼，她说鱼子吃起来像沙子。爸爸就哈哈大笑，觉得孩子很有想象力。我的疑点在于，女儿什么时候吃过沙子。后来一问，果然是爸爸带的时候。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不同。”小江相信表扬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一边表扬，一边给丈夫参与的机会很重要。没人能抵御亲生孩子的需要和陪伴，你就在他面前表现得你很需要他，娃娃需要他。然后就是表扬，还有洗脑。说大牛都是一边看孩子一边工作的，洗脑成功就好了。”小江说。

小江就是事业上独当一面的女人，她也觉得育儿问题的根本是夫妻之间的平等。“这个平等不是物质上的，是精神上的。女人不因为男人不带孩子就吐槽，男人不因为女人埋怨就消极对待。两个人共同找出一个折中方法，运营好‘家’这个公司和‘孩子’这个分公司。合伙人一起开公司不能精神不平等呀，那就散伙了。”小江说。☑

（实习记者王雯卿对本文亦有帮助）